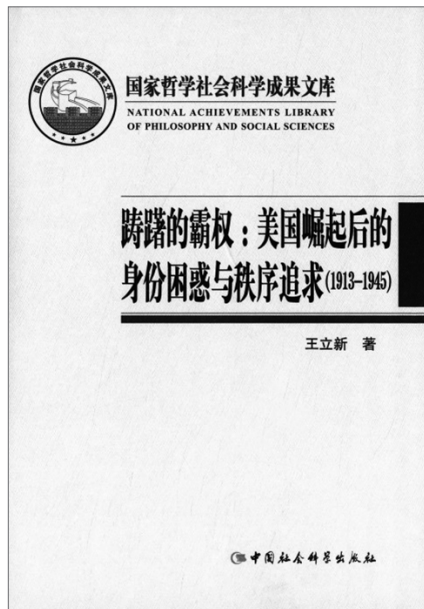


# 身份認同和世界秩序的追求

## ——評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

● 吳翎君



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一 天秤的兩端：美國對外關係的理想與現實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中英文學界與二戰研

究的相關著作近年順勢受到關注，其中米德 (Rana Mitter) 的《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於2013年發行，中文版趕上熱潮被推為「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sup>①</sup>。隨着「中國崛起」，長期以來中國被西方世界所遺忘的盟邦角色終於獲得遲來的肯定——圍繞中國在二戰時期對英美盟邦的戰爭策略和總體戰的貢獻被突顯出來。當「中國崛起」成為全球震撼，崛起後的中國將對國際秩序輸出福祉或是帶來一場災難？世界是否仍能維持「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或轉向「中美共治」(Chinamerica)，甚或中美兩大強權勢必走向「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 一決勝負？兩大強權的未來走向始終受到中美關係史學界的高度重視，並從不同角度提出精闢見解或高瞻示警。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最近撰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以下簡稱《躊躇的霸權》），

《躊躇的霸權》回顧了一戰前夕到二戰結束後，美國邁向世界超強大國的過程中對自我身份的困惑及其參與國際秩序的理想與現實，是中國大陸學界嘗試以國際史視野探討美國崛起及其自我定位的新穎之作。

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回顧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到二戰結束後，美國邁向世界超強大國的過程中對自我身份的困惑及其參與國際秩序的理想與現實。作者於〈導言〉自陳：

試圖從中國學者的現實關懷出發，從一個新的視角對1913-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係進行解釋，認為這一時期美國對外關係的主題是崛起後的美國如何追求新的國家身份與國際秩序。(頁9)

美國人在打造「大國命運」的過程中，在國內存在不同意識形態的爭辯，走的是一條「躊躇之路」。作者以國際主義作為主軸，展現美國政府、民間人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參與國際政治，並成就一種文化國際主義的高度視野。

作為一名研究美國史的中國學者，王立新抱持怎樣的學術關懷？作者坦言，希望「通過考察美國認同國家身份與國際秩序的過程來為中國思考和解決崛起過程中的身份困惑和秩序憂慮提供某種參照」(頁11)。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逐步從國際舞台的邊緣走向世界的中心，並且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全面向世界各國輸出以民主為核心信仰的「美國夢」。姑不論美國夢是否有其價值以及民主社會可能存在哪些危機，中國大陸學者如何詮釋美國大國崛起之路，着實引人注目。

學界論及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霸權逐步崛起的英文專書至少上百本，精心剖析地緣政治、軍事衝突和國際關係的前輩大師可謂眾星雲集<sup>②</sup>。過去中國大陸學界雖不乏相關美國史著作，但多數囿於反美意識形態而較難有客觀持平之作，而《躊躇的霸權》是中國大陸學界嘗試以國際史視野探討美國崛起及其自我定位的新穎之作。該書刻意以1913年威爾遜(Thomas W. Wilson)

擔任美國總統為始(而非1914年一戰爆發)，以威爾遜上台作為美國扮演自由國際主義倡導者的新起點和新角色，並作為美國大國崛起的伏筆。一戰結束之後，美國本有能力成為國際領袖，但美國人卻因擁抱孤立主義而徘徊不前，拒當世界領袖。1930年代，美國深陷孤立或是干預的外交大辯論，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顯現美國的孤立主義無以自保其國土安全，美國因而再度捲入世界大戰並擔負領導盟軍之責任，及至二戰結束，終於確立了其超級大國地位和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勝利。作者立意說明的是，美國人在打造「大國命運」的過程中，在國內存在不同意識形態的爭辯，走的是一條「躊躇之路」。作者最大用心不在於縷述政治、軍事的細瑣史實，而是以國際主義作為主軸，展現美國政府、民間人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參與國際政治，並成就一種文化國際主義的高度視野，以及伴隨美國崛起的全球化發展脈絡。

近年中國大陸學界頗為關注美國文化的全球化研究，王曉德頗具好評的開路之作《文化的帝國：20世紀全球「美國化」研究》即為一例<sup>③</sup>。該書試圖梳理二十世紀初以來全球「美國化」的現代性根源、兩次大戰期間美國大眾文化對歐洲國家的影響、二戰後美國文化外交的擴張，以及現代消費社會的形成。該書題旨雖為全球「美國化」，但作者同時強調美國大眾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所體現的文化概念在非美國文化場景中的「異化」，包括接受國對於來自美國大眾文化及其形式

的模仿、借鑒、吸收或排斥的整合過程；因此所謂的「美國化」並不會帶來全球文化的同質化和單一化，深植於不同文明國家的文化特性和文明的多樣性更不會就此消失。與《躊躇的霸權》一樣，此類專書除了突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本土培養的美國史研究專家的學術成果，更顯示其試圖與歐美學界對話的強烈意圖。

理想與現實往往被視為美國對外關係天秤的兩端，當面對國內與國外情勢的重大壓力時，兩端往往相互牽引，顯示美國外交利他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兩重性格<sup>④</sup>。《躊躇的霸權》扼要回顧了美國學界近半世紀以來論述美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方法、概念和解釋觀點的演變，諸如：冷戰初期現實主義派強調地緣政治和國際現實、1970年代左右興起的修正派強調商業擴張等經濟力量對決策制訂的影響、國際合作主義範式強調美國對外關係的協調作用等。1980年代以後，受到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影響，外交史界逐漸興起從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對美國二十世紀外交史提出重新闡釋，部分學者受後現代主義史學影響，轉而強調個人、大眾、種族、女性等跨國議題的文化轉向的外交史研究。1990年代以後，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衝擊嚴重影響了傳統外交史研究中的現實主義的範式，代之而興的是打破以國家為中心的全球史和國際史的趨勢，領軍學者為哈佛大學日裔學者入江昭<sup>⑤</sup>。這些研究回顧正說明了歷史學家在時代鉅變下的學術關懷往往與現實互相呼應。

## 二 美國大國崛起的「躊躇之路」

《躊躇的霸權》呼應了近二十年來國際關係史的文化轉向和全球化效應，亦即打破以政治外交為主體的論述，將國家認同和意識形態納入美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本書共有606頁，約六十萬字，除序章和結語之外，共有七大章節：「新角色、新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威爾遜自由國際主義的興起（1913-1921）」、「保守國際主義得勢：共和黨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國際秩序（1921-1929）」、「擁抱孤立主義：國際秩序的瓦解與美國的反應（1929-1939）」、「孤立還是干預：外交大辯論與戰爭的到來（1939-1941）」、「自由國際主義的勝利：戰時外交與國際秩序的『美國化』（1941-1945）」、「培育跨國共同體：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秩序」、「傳播美國生活方式：美國文化輸出與全球秩序」。從章節架構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立意創新的企圖。

就內容而言，第一到第五章依時序梳理一戰爆發前夕到二戰後美國國內的政治精英及其對外政策的取向，作者大量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較少使用原始資料，然而卻巧妙地剪裁各家說法，鑄成具有中心體系的通論著作，顯現作者具有獨到的融會和詮釋之功力。

作者以美國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勢力的辯論和激盪作為兩大主軸，來論述政治精英如何看待美國獨立以後國家自身的歷史定位及其所應扮演的國際角色。一戰的爆發使得美國面臨建國以來首次參與歐

《躊躇的霸權》呼應了近二十年來國際關係史的文化轉向和全球化效應，亦即打破以政治外交為主體的論述，將國家認同和意識形態納入美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

《躊躇的霸權》論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主張終於獲勝。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在美國歷史上是開創性的，「四大自由」思想的提出因此被視為人權國際化的開端。

洲內部事務的重大爭議。威爾遜總統「十四點」(Fourteen Points)和平計劃，成就其個人理想的傳教士外交和造就亞非等殖民地國家脫離歐洲強權的「威爾遜時刻」(Wilsonian Moment)⑥。然而，一戰後美國是否加入國際聯盟(國聯)的辯論，正考驗着美國人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並如何擔任重責大任的抉擇。美國最終沒有加入國聯，接班的共和黨政府拒絕威爾遜自由國際主義的理念，在外交上採行保守國際主義。他們相信司法途徑是解決國家衝突的最好方式，主張建立國際司法和國際仲裁機制來避免戰爭(例如以《非戰公約》來遏制戰爭、召開裁軍會議等措施)，以及以經濟力量幫助歐洲各國復蘇的經濟合作主義(例如道斯和平計劃[Dawes Plan])。在1920年代保守黨主政時期，美國的經濟繁榮更讓美國人相信這將是促使世界和平的力量，美國資本和技術的輸出將有助於世界的繁榮，不必仰賴政治力量來發揮其世界影響力。

然而，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加深了美國內部的巨大分裂，究竟是持續利己主義的政經政策，抑或必須共同關注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日本在遠東製造的危機，成為美國內部辯論不休的重大議題。美國人在1921至1941年間拒絕維護自己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迴避作為世界大國應承擔的世界責任，特別是在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盛行、經濟混亂和國際秩序動盪不安的1930年代，世界急需一個發揮團結、協調和領導作用的中心，但美國卻擁抱孤立主義，不願成為這一中心，導致國際領導角色的缺失。

其結果就是經濟危機的加深、國際秩序的混亂和二戰的爆發(頁203)。

《躊躇的霸權》論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主張終於獲勝。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提出「四大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並將「四大自由」的理念推廣及於全世界，這在美國歷史上是開創性的，即使是威爾遜也沒有將人權的保障作為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四大自由」思想的提出因此被視為人權國際化的開端。踵繼其後的是1941年《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中將保障人權視為國際宣言內容。1942年的《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更是提出人權目標的多邊國際宣言，成為盟國的戰爭目標和未來國際秩序的準則之一。羅斯福出於理想主義和國家安全的雙重考量，將人權與國際秩序相聯結，認為促進人權有助於世界和平與美國的安全，因為對內暴政與對外侵略是一對孿生兄弟，一個尊重其人民權利的政府才可能在國際上尊重其他國家及其人民的權利。

美國在二戰期間以大國地位向外輸出核心價值——民主信仰、公正社會和保障人權的理念；深信民主的傳播必須仰賴建立典範，美國必須努力扮演這樣的角色，也體認到民主在全世界的不斷傳播意味着世界愈來愈安全，而美國更是民主陣營的守護者，擔綱世界警察的重大責任。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可謂密不可分，這樣才得以保證美國免遭侵略的國土安全(頁352-53)。曾代表共和黨角逐

1940年總統大選的威爾基(Wendell L. Willkie)於1943年出版了《天下一家》(One World)一書，也呼籲美國必須承擔捍衛民主價值和世界和平的責任<sup>⑦</sup>。二戰結束前後，美國社會已普遍形成結束孤立主義的共識，亦即美國終於認同並承擔大國責任。

鑒於一戰所帶來的巨大災難，戰後文學、藝術和教育家等民間人士活躍於非政府組織的全球和平活動，希望由民間力量來消弭國家之間的戰爭，成為一戰以後普遍盛行的文化國際主義現象，此一說法為入江昭所倡導<sup>⑧</sup>。本書第六章考察了三種非政府組織——和平團體、知識團體和傳教團體——在國際秩序構建中的作用。關於戰後和平組織的研究，過去主要集中於國聯等跨國政府組織，本書著意於探討民間團體如何促進跨國諒解和文化交流，對世界和平秩序作出的重大貢獻，並以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為個案呈現作者對中國的關懷。

作者認為與一戰爆發前的和平組織相比，一戰中誕生的和平團體有一些突出的特點：前者具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取向，而後者則更具有平民和民主色彩，大批學生、婦女和工人加入自由和平主義團體；前者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後者更加世俗化，其和平理念主要來自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思想；前者謳歌美國，而後者對美國社會和國家政策持批判態度，成員包括很多社會主義者和勞工領袖，因此具有很強的左翼傾向。這一宏觀看法深具意義，並且呼應研究和平運動的論者所言，正是一戰中誕生的這些和平

團體率先提出國際和平與國內改革的不可分割，動員美國全社會的力量以法律改革和聯合行動來追求和平的目標，從而開啟了現代和平運動<sup>⑨</sup>。此外，作者曾研究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及192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本書更將1920年代教會本色化運動置於國際史的脈絡下來審視，探討一戰後美國海外傳教運動與傳教團體對改造國際秩序的努力。

最後，作者利用原始材料深入探討了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國際學會，該學會代表一戰後知識精英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潮，以促進國家間相互理解、抱持科學信仰以理性化解國家間的衝突為宗旨，並將公共輿論視為影響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的重要力量。作者的討論重點不在於國際關係，而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對於整個太平洋地區和不同民族間諒解合作的作用。整體而言，作者認為該學會的努力是失敗的：

這一失敗既是學會無法控制的外部國際環境發生巨變——大蕭條、日本軍國主義的得勢和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同時也與其自身的局限性有關，包括各國別理事會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學會對科學和理性的天真信奉。(頁476)

由此看來，作者對於非政府組織所能發揮的作用似不表認可，認為其活動更多受到國內和國際政治氣候的影響，特別是學會成為智庫後，很難維持獨立的知識立場。

在第七章，作者考察一戰以後美國文化輸出與全球秩序的關聯。1917年，美國政府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Public

本書考察了三種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秩序構建中的作用。作者對於非政府組織所能發揮的作用似不表認可，認為其活動更多受到國內和國際政治氣候的影響，特別是學會成為智庫後，很難維持獨立的知識立場。

杭廷頓以「世界主義」、「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概念來論述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可以投射於近代中國與西方接觸後的百年交纏演變，有助探索「何謂中國」、「何謂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圖像與建構國族共同體的論述。

Information) 的任務是對內促進戰時美國國內的團結忠誠，對外宣傳美國的理想主義和為自由而戰的戰爭目標。作者分析了該委員會在中國、埃及、西班牙、印度和其他亞非國家的宣傳和效應，包括貫徹威爾遜理念的內外傳播，精準論述一戰以後美國大眾文化的向外傳播途徑(如遠征軍、慈善人員、旅遊、貿易、好萊塢電影等)、歐洲主要大城市的美國化時尚，以及一些歐洲精英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批判抵制。對於戰時美國對華文化政策，作者有精闢的分析，認為「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初，以羅斯福顧問居里(Lauchlin B. Currie)提出的「文化租界」(cultural lend-lease)為主導思想，強調技術援助而不是文化思想傳播，因而對華派遣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並培育中國本土的技術專家，認為可以取得立竿見影之效。從1943年起這一技術援助遭到批評，領軍者為時任國會圖書館遠東代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他強調思想與技術同等重要，要求美國政府資助更多的人文與知識的交流。

對於美國文化輸出後的現象，作者扼要整理出不同看法如下：視之為進步力量、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美國化」作為一種建構的概念(世界並未美國化)或真實的過程(但不應誇大他國對美國文化的抵制)。此外，也有學者專注於研究冷戰後全球化浪潮對美國的回饋和地方文化走向全球化的過程。最後，作者分析美國文化輸出後所形成的一種普羅大眾的國際文化(如牛仔褲、籃球文化、麥當勞食品、好萊塢電影等)，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人民共享的文化形式：

正是美國文化的全球傳播催生了一種共享的國際文化或全球文化，促成了世界共同體觀念的興起，整個世界開始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從這意義上說，所謂美國「生活方式」的傳播具有世界秩序的意義。(頁543)

### 三 身份認同、大國責任和國際和平

如上所述，《躊躇的霸權》一書以一戰以後美國內部對外政策的意識形態爭辯以及美國對自我角色的定位來論析其大國崛起之路，足見作者的學術關懷。筆者認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的《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所探討的一戰後「新中國」意識的崛起和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努力，以探尋近代中國的身份認同，適與王立新的這本書作為中美兩國探尋大國崛起之路的敘事參照<sup>⑩</sup>。

此外，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又譯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中，以美國內部多元族群融合的問題來探索美國與世界的融合及國家認同的危機，他對二十一世紀「美國人」脆弱的時代信念，以及美國精英份子的「去國家化」和過度向世界主義傾斜，提出深刻的憂慮<sup>⑪</sup>。美國人如何定義自己、決定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而世人

又如何看待美國的角色，這些都會塑造美國的身份認同。杭廷頓以「世界主義」、「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三個廣泛概念來論述美國與世界的關係，認為這三個概念推進了美國歷史，使美國改造了世界，但也使美國人徘徊於「誰是美國人」的認同之路。杭廷頓提出的概念同樣可以投射於近代中國與西方接觸後的百年交纏演變，有助探索「何謂中國」、「何謂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圖像與建構國族共同體的論述。上述不同視角都有助於我們以更寬廣的國際視野來觀察中美兩大強國對內和對外的身份認同與國際角色的定位。

《躊躇的霸權》的論述時段止於二戰結束，未觸及冷戰時代及共產主義陣營崩解的1990年代，誠為遺憾之處，此或可為作者未來努力的續篇。作為一本宏觀性著作，本書難免簡化了一些細部論證，例如作者比較十九世紀後期建立的維也納秩序與一戰以後的華盛頓體系外交，論述英美兩大國縱橫全球外交的省思，卻忽略了對歐洲均勢體系、地緣政治失衡以及盟國之間不同命運交織的變動分析，以及未能析論一戰後凡爾賽體系的道德合法性問題（例如對德國的苛刻，並將共產國際蘇聯和戰敗德國共同排斥於此一體系之外）；此外，對於一戰以後美國內部興起的「赤色恐慌」的描述亦略為不足。不過，這些小缺失並不妨礙本書作為一本宏觀之作的可讀性和學術性。

如同民族主義是一種建構的「想像共同體」，本書討論的國際主義其實也是一種跨越國境賴以共存共生的「想像共同體」，在更深層次

上，不同文化和群體共同建構以全人類為主體的普世價值，追尋全球共同體 (global community) 與人類共同體 (human community) 的最高理想。誠如入江昭近年來在其系列著作中一再倡導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係以全人類作為共有利益及普遍性原則，如果非國家行為者持續發揮提升人類共同意識的安定力量，建立起不同個體和群體間「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y) 的感知情境，二十一世紀有可能建構出公民社會的世紀。這也是為何入江昭著意於探討「慈善與公民社會」兩股力量在二戰結束後的美日關係和對亞洲的諒解上扮演了相互理解和對話的重要角色<sup>⑫</sup>。

當今世界幾乎所有權力中心的內部都發生重大的變化，具有不同文化、歷史和傳統秩序理論的各個地區如何維護世界共同體系的合法性？1971年首次訪問北京、打開中美重新建交之路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繼《論中國》 (On China) 一書省思半個世紀以來風雲變化的中美關係之後，在新著《世界秩序》 (World Order) 中概陳「自由」與「秩序」是世界秩序長治久安的兩條真理，雖然它們有時被視為人類歷史經驗中的兩個極端，但其實兩者應被視為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第一，沒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時的鼓噪得以維持，最後也會製造出反對自己的力量；第二，沒有一個維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會有自由。建立在此種意義上的世界秩序必須靠長期培育，不能強加於任何人，在即時通訊和政治劇變的時代尤其如此<sup>⑬</sup>。

作為一本宏觀性著作，本書難免簡化了一些細部論證，例如作者比較十九世紀後期建立的維也納秩序與一戰以後的華盛頓體系外交，卻忽略了對歐洲均勢體系、地緣政治失衡以及盟國之間不同命運交織的變動分析。

## 四 結語

《躊躇的霸權》一書，意在探索一戰以後美國對國際秩序的認知理念和內部文化價值相互激盪所形塑的國家認同之路。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中立政策無法使其遠離戰爭，更無法保證美國國土安全；二戰後美國輿論普遍相信美國沒有加入國聯、拒絕通過有利於世界和平的司法機制和與愛好和平的國家合作，間接導致1930年代極權主義的興起和二戰的爆發，這是一大錯誤。為了避免悲劇的重演，美國必須承擔國際義務，通過參與國際合作，甚至領導世界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民間的力量和非政府組織更扮演着化解仇恨和杜絕衝突的重要角色，這也促使美國作為民主大國反思文化向外輸出的價值，並由此喚起美國人的身份認同。筆者以為，關注中美關係的讀者或許可以從本書理解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之路，通過「他者」的歷史演變來理解美國民主化社會對於核心價值的追尋、徘徊、爭議及代價，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國際地位的崛起及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傳播，來思考所謂「大國」對於維繫國際秩序與世界和平的重大責任。

關注中美關係的讀者可以從本書理解美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之路，通過「他者」的歷史演變來理解美國民主化社會對於核心價值的追尋、徘徊、爭議及代價，思考所謂「大國」對於維繫國際秩序與世界和平的重大責任。

### 註釋

①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London: Allen Lane, 2013). 中文版參見米德(Rana

Mitter) 著，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蔣永強譯：《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② 近十年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參見Michael H. Hunt,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該書從全球化的脈絡宏觀百餘年來美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探討美國全球擴張的歷程及其如何統領世界的霸主地位。

③ 王曉德：《文化的帝國：20世紀全球「美國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④ 對於美國對外關係的宏觀解釋，有許多不同的流派和說法。相關討論可以參見Ernest R. May, James C. Thomson, Jr., e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 A Surve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Bradford Perki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Empire, 1776-1865*; Walter LaFeb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I, *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 1865-1913*; Akira Iri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II,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1913-1945*; Warren I. Coh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V,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1945-199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⑤ 入江昭對跨國史和國際史研究已有多本系列著作，參見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2012年入江昭等人從國際史視角探索二戰以後全球對於人權主張和法律見解的演繹進程，參見Akira Iriye, Petra Goedde, and William I. Hitchcock, eds., *The Human Rights Revolution: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關於國際史研究的文化轉向，參見吳翎君：〈從徐國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談國際史的研究方法〉，《新史學》(台北)，第22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83-215。入江昭學思之路的轉變，參見劉克倫、石之瑜：《入江昭對世界與中國的中間主義立場——一種多元身份的知識視野》(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入江昭著，楊博雅譯：《我與歷史有個約會：入江昭治史心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⑥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⑦ Wendell L. Willkie, *One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3)。

⑧ 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3, no. 2 (1970): 115-28.

⑨ Charles DeBenedetti, *Origin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1915-1929* (Millwood, NY: KTO Press, 1978), x-xi。《躊躇的霸權》在綜述美國學界的說法後，歸納出1920年代美國社會具有三種不同思想傾向的和平團體：一、有較強民族主義色

彩的法治主義團體(法學家、律師、法官和政界教育精英)；二、強調集體安全和國際制度建設的國際主義團體(社會科學家、教育家、律師和記者等自由派人士)；三、具有較強道德主義和跨國色彩的自由和平主義團體(基督教團體、婦女組織與其他反戰的激進和平主義團體)。此一說法有助於後繼研究者做出更細膩的分析。參見《躊躇的霸權》，頁381。

⑩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譯本參見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亦可參見吳翎君：〈從徐國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談國際史的研究方法〉，頁183-215。

⑪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⑫ 詳見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Philanthropy and Civil Society in U. S. Foreign Relations", in *Philanthropy and Reconciliation: Rebuilding Post-war U. S.-Japan Relations*, ed. Tadashi Yamamoto, Akira Iriye, and Makoto Iokibe (Tokyo and New York: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6), 57-60。

⑬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Introduction: The Question of World Order", in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1-8.